



独脚将军 传奇

谢 良著



華夏出版社

独脚将军传奇

谢 良 著

华夏出版社

1987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军委原炮兵副政委、富有传奇色彩的独脚将军谢良撰写的革命回忆录。书中有谢良十五岁参军，在党的培养下由一个贫农的孩子成长为红军唯一的独脚将军的具体描写；有谢良在长征中率领后卫部队闯湘江、乌江，越赤水，抢渡金沙江和三爬雪山，三过草地的不平凡的战斗历程；有谢良在迪化被关押四年期间，以独脚残废军人身份，领导全体难友同新疆军阀盛世才进行卓绝斗争的生动描述。全书情节曲折，故事生动，具有浓郁的传奇色彩，是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独脚将军传奇

谢 良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 10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3 千字 插页 1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80053-072-8/1·029

书号：10484·029 定价：1.00 元



作 者 小 传

谢良同志，江西兴国人，1915年出生在塘石村一个贫农家庭里，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红三军八师迫击炮连政委，并参加了第一～五次反围剿战斗。1934年随红军长征，率领后卫团曾先后闯过湘江、乌江、赤水，抢渡金沙江，三爬雪山，三过草地，打过不少恶仗。1936年任西路军十三师政委，在山丹一次激战中，不幸左腿负伤致残。1939年去苏联装假肢，途经迪化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遂滞留新疆，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1946年始由党中央营救出狱。1947年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任平原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共平原省省委委员、石家庄高级步兵学校任政委，军委炮兵学院政委、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少将军衔。

“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被关押达五年之久，直到1975年才经毛主席批准，给予平反，并恢复了炮兵副政委的工作。1983年任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参加中国作协，著有《边城女囚》、《铁流后卫》、《五颗红心》等书。

前　　言

江西省兴国县，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创建的中央苏区的一个模范县。我就出生在这个县的塘石乡。这个县，在当时无论是生产和支前，还是在动员群众参军和扩大红军的工作方面，做得都是很出色的。就拿参军来说，当时全县共有 24 万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就有 8 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1934 年就有一个师的人参加，为此，中国工农红军专门建立了兴国师。

象其他革命根据地一样，这个县为革命斗争，为新中国的创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了解，当时参加革命的几万人中，活到现在的不过几百人，而我们塘石乡当时参加红军的一百多人中，现在幸存的也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中，我还是个一条腿的残废。当时参加的我的一些同乡、同学和邻居都牺牲了，我的二弟、当时曾任过江西省军区政治部青年部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谢毓漳，长征后，跟随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在苏区打游击时，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每当想起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的时候，我就热血沸腾，总想把他们写出来，为后人留下一些革命历史的资料和进行传统教育的材料，让青年人能够从中了解到老一辈革命者所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并以此来激发他们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的勇气。特别是，最近老家兴国县党史征集办公室又派人来向我征集资料，这更促使我下了写这本回忆录的

决心。

这本《独脚将军传奇》，是根据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和重要的战斗写成的。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我的苦难的童年和怎样走向革命的经历。其中写了我的家庭情况、童年的生活和学习情况，以及我参加土地革命、农会活动和在五次反“围剿”的某些战斗情况。第二部分，记述了我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经历。其中写了我随部队突围西进的情况，写了遵义会议、金沙江阻击战和三爬雪山、三过草地，以及我在山丹战斗中负伤的情况。侧面反映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领导长征的丰功伟绩，揭露了王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第三部分，记述了四方面军在西进中的失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在新疆被关押期间，同新疆军阀盛世才斗争的情况和学习的情况。

在这本回忆录中，有一半章节是根据我自己的回忆加工整理的，还没有发表。另一半章节是已经发表过，这次成书时又作了某些删改和补充。由于事情差不多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身边又没有资料，全凭自己的记忆，再加我水平有限，其中所述的历史情况，以及某些情节和时间，难免有不准和不妥之处，还望经历过这些生活和斗争的老首长、老战友，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作者小传

前言	(1)
一 少年时代的向往	(1)
二 走向征途	(6)
三 突围西进	(22)
四 遵义光芒	(38)
五 金沙江畔阻击战	(57)
六 三爬雪山	(67)
七 三过草地	(82)
八 华家岭阻击战	(114)
九 难忘的山丹战斗	(123)
十 心向延安	(128)
十一 狱中怒火	(138)
十二 红心向党	(158)
后记	

一 少年时代的向往

我的故乡塘石村，靠近兴国县城，那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普通通的南方村镇，在赣江上游一条支流的东岸。村前有一条清澈碧染的河水缓缓流淌，一张张竹排时往时来。西岸河堤上长着丛茂的毛竹和林立的红枫。一到深秋，枫叶殷红殷红的，就象镶嵌在蓝色天际的无边的流霞。故乡秀美的图画，常常使人想起古人吟咏的“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诗句。古稀之年，牵动我绵绵乡情的不仅是这风景如画的山水田园，更有故乡那终生萦怀的幼少年时代的生活和向往……

(一)

二十年代的塘石村，在兴国县城一带称得上是个大村镇。全村约有二三百户人家，两千多口人，共分上下两个自然村。我家在下村的尽南角。家门前有一个高大的黄土堆，坡上生长着一棵古老茂盛的红枫，村里人谁也说不清它的历史。

“足有二三百年了吧！”老人们常常望着树身这样说。

这棵红枫委实粗壮，十几个人手挽手才能将它环抱一周。树冠的枝叶茂盛，老枝新杈无拘无束地向四面伸展着。枝干上长满密密实实的叶片，就象一把天然的巨伞，支撑在我家的门前，给偌大个土坡遮满了荫凉。

在塘石村，这树似乎成了一种古迹，成为村民们心目中的

名胜。每逢夏季，这里便成为乡亲们劳作间歇时乘凉的场所。傍晚，食罢晚餐，人们又三三两两地聚拢来，坐在枫树下、土坡上，摆龙门阵，谈家常，有时还讲朱毛红军和东固 24 团红军闹革命的故事，吸引得女人和孩子们也纷纷前来打坐。讲故事的多半是老人或外乡来的庄稼人，他们说话开门见山：

“听说红 2、4 团正在东固、富田打土豪、分田地呢。”

故事常常就这样开了头。

“打土豪、分田地，有这样的事么？”乡亲们惊异了，脸上溢着兴奋的光。

在土地尽归地主，穷户只有一、二担田地的塘石村，谈论打土豪分田地，无疑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事。大家屏息静听着，不时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各自在心底编织着穷人分田分地的理想，就连我这少年的心中也萌动着强烈的希冀。

每每听着这样的故事，我常独自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1915 年 4 月 29 日，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里。据父母说，就在这一年家乡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淹没了两岸的庄稼和村庄，有些地方淹死了不少人。我家虽然地势高，还是灌进了水。有一次一不小心把我掉进了水里，幸好抢救及时，没有淹死，大人认为我命大，因而取名叫“石泉”，就是淹不死的意思。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弟弟。这样，我们全家就有了七口人：父亲谢德标，母亲刘冬秀，二弟谢毓璋，三弟谢毓丰，再加我和二弟的两个童养媳。当时我的家境很苦，只有土屋三间，谷田三担，完全靠租耕地主的 15 担谷田为生。收获了，父亲和我们便沿着漫长的村路将收作的一半挑入地主的谷仓。每年过冬全靠吃竽头、红薯等杂粮糊口度日。严冬腊月我没有棉衣穿，经常冻得浑身发抖，脸色发青，嘴发紫。晚上全家只靠两条飞絮的棉被抵寒。苦难的日子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8岁那年，我进学校勉强读了两年半书，成绩比较好，为参加革命及工作和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难，只好放弃学习跟上父亲下田劳动。13岁，我开始在地主家里做短工。收工了，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把第一次挣到的70枚铜板交到母亲手里，便一头躺在床上，饭也不想吃。母亲望着手中的铜板，心痛了，“唰”地流出了辛酸的泪水……

突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石泉，去睡吧！”这是父亲的催促。它使我从幼年生活的回忆中惊醒过来。望着从树下渐渐散去的人群，我依旧不愿挪步。心想东固、富田的红军也会到塘石村来吗？也会象传说中那样：“打土豪、分田地吗？”

不久，手持梭标、长矛的红2、4团打下了家乡附近的兴国县城。他们硬是在油桶里燃放鞭炮，佯装机关枪，赶走了县城里的地主武装“靖卫团”。

“听说红24团在兴国打了胜仗”。红枫树下讲故事的外乡庄稼人又这样开头了。

真奇怪，这些陌生的外乡汉怎么会知道这多鲜事儿。后来，我参加了革命，才听说这些在枫树下讲故事的外乡人，有些就是地方党组织派到塘石村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地下党员，据说其中还有赣南特委书记陈毅派来的同志哩！

塘石村终于撒下了革命的火种。1928年村里成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我成了协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这年冬季，红四军政治部在兴国公布了“土地法”，规定了土地分配政策和措施。村、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们加入了赤卫队，拿起了梭标、长矛，村子里燃起了革命烈火。往昔夏夜红枫树的绵绵絮语，记载了贫苦农人心底的歌声：

我们大家来暴动，

消灭恶地主，
农村大革命。
打土豪，除劣绅，
一个也不留情！
.....

春天来了，红枫树抽出了新的枝叶，勃发着新的生命。

(二)

1929年初夏，是兴国历史上难忘的岁月。毛委员和朱军长率领红军从福建来到兴国。

“朱毛红军来了。”

沉寂的兴国古城飞出了欢声，流出了笑语。

7月1日，在兴国县城北面的大广场上，红军召开了万人大会。会场上，红旗如林，万头攒动。兴国城周围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闻讯赶来。主力军、地方武装和群众挤满了会场。主席台上，毛委员作着发展工农武装，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报告，声音坚定有力，铿锵作响：

“乡亲们！为什么过去你们种田没有饭吃，织布没有衣穿，那是因为都被地主豪绅剥削去了。我们穷苦人要翻身，就要靠拿起枪杆子，成立赤卫队，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巩固红色政权……”

朴实的话语，浓重的湘音，不时在贫苦农人的心头滚动，犹如苍茫的赣水流荡在每个人的心田，激起层层波澜。

会后兴国上下掀起了参军的热潮。

这一年，弟弟加入了红军。或许是我已经有了童养媳的缘故，仍然留在家中与牛为伴。河边牛儿悠闲地啃食青草。我坐在堤岸上，脑海中却时时浮现出万人大会上那明亮的枪

支和闪闪的红星。

“我要参军！”终于，我把这心思和父母说了。

“去吧，只要你愿意。”老人饱经风霜的脸上绽出了微笑，同意了我的请求。历尽了苦难的父母会理解自己的儿子，也懂得革命的需要。参加红军，巩固红色政权，在兴国人民心中扎下了根。

翌年夏季，红军扩军的消息传来。清晨，在河边我与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伙伴芳德和才前二人畅谈各自的打算和向往时：

“参加红军”两个人不加思索，异口同声地说。

参加红军成为我们的共同心愿。1930年7月，我们三人一起参加了红军队伍。那年，塘石村一百多人的赤卫队集体参加了红军，并编为兴国县红色警卫营第二连，驻扎在县城。那时我才15岁，已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心里说不出的高兴。与我编在一班的有同房哥哥谢毓海，他当了班长，后来还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上发给我一支马枪，这可把我乐坏了。过去做梦也想得到一支枪，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爱枪如命，枪不离手，连晚上睡觉也抱着枪睡。当时，我曾暗下决心，一定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打倒地主、国民党，消灭剥削，把革命进行到底。

同年10月，我从兴国红色警卫营被选调到红3军8师教导队，学习单兵和班、排、连教练知识，同时学习政治知识——《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四个月的集训，使我从一个贫农的孩子向一个红军战士过渡。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红3军8师炮兵连当连政委，不久就投入了反第三次围剿的老营盘战斗。尔后，我随队参加了第四、五次的反围剿的战斗。

二 走 向 征 途

1932年3月我从红3军随营学校毕业后，分配到8师24团3连当指导员，部队向广东进军，在水口圩遇上军阀陈济堂的部队，这次战斗是红军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消耗战。后来在东坡、黄坡同敌53师李明、59师陈世骥打了一仗，师长李明身负重伤被俘，两个师被我们全部消灭，歼敌一万多人，缴获了不少银元和枪支弹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

1932年6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红7军团，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10师编为7军团19师。我从3军调来7军团工作，分配到19师59团3营9连任指导员，到职不久，我部即奉命去袭击驻守在金鸡县城外的国民党88师一个步兵团。当时我连是团的尖刀连，我带领部队急行军五六十里，中午到达金鸡县附近，发现敌人正在构筑工事，我们趁其不备立即发起进攻。在激战中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尚未跟上。原来上级已改变作战计划，准备夜间去袭击消灭敌人，但未通知我连。当我们同敌人激战几十分钟后，敌人组织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向我连反冲锋，我沉着地指挥全连战斗，并亲自用轻机枪向扑上来的敌人进行扫射，全连同志英勇顽强坚守阵地，硬把敌人的冲锋压了下去。突然，我感到左肩被什么东西猛撞一下，感到冰凉，马上鼻子和嘴里流出了血，站在我身旁的通讯

员王玉山说：“指导员你负伤了。”当时我没有听见，也无精力去考虑自己是否负伤，眼见敌人离我连只有几十米远，又向我们发起冲锋。我想到主力部队未上来，弹药又不足硬拼下去伤亡大。我一边指挥部队向敌人反击，一边组织部队迅速后撤。正在这时候，敌人靠我们更近了，看见我用红绸裹的驳壳枪，认为我是一个红军干部，敌人边追边喊：捉活的！捉活的！都向我这边冲来。若敌人用枪射击的话，可能当场会被他们打死。我连边打边撤四、五里路后，幸好全营部队赶来了，敌人才不敢追来。我将部队安排后就到一个小山头上的团前进包扎所去治疗，这时我才感到左肩很痛，身上有血，但不知伤在那里。后经医生检查发现我左肩负伤，肺被打穿，左肩胛骨打碎，伤势较重，血还不断从鼻子和嘴中流出来。医生立即叫我躺下不要动，并消毒、止血、包扎。这时遇上了3营营部重机枪排排长李清云同志，他也负了轻伤。他见我伤重需送后方医院，立刻去找了一付民兵担架，陪送我去后方医院治疗。在路上，他怕我受震动流血过多，就到地主家去找了两条棉被，放在担架下，下垫上盖。连续走了两天，在一个大山沟的小村庄和大庙中找到了后方医院。在庙里的大殿上，一个挨一个的躺着二三十个重伤员，由于敌人的封锁，医院中缺药治疗，特别是缺止痛消炎药，许多病员因伤口发炎疼痛难熬，日夜呻吟，使我也无法休息。我的伤口因无药也经常化脓，医生护士只好采用土办法消炎去脓。他们用盐水消毒过的粗纱布，在伤口处轻轻地把脓用拉锯办法把它拉出来，每一次换药消脓我就要痛半天，这样我的身体愈来愈弱。李清云排长见我这种情况，很关心我的身体，他暗暗地设法买了猪肝，炒好后放在我床边，他因伤愈就出院归队了。当我见到猪肝后，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深感到阶级兄弟的友爱和温暖。我因左肩和肺负伤，

只好用右侧躺着睡觉。这样在病床上躺了“七七”四十九天，吃饭、大小便等活动都是由护士帮助。虽然住院中缺药、盐和沙布等医疗用品，但是乡亲们热情慰问，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我们的伤口恢复得很快。有一次院长来病房查房时，发现我伤口时好时坏，化脓不止，他很奇怪。经仔细检查，发现伤口中还有四、五块碎骨未取出，院长立即动手把它取了出来。不久伤口停止化脓，慢慢长出新肉收口了。在这段住院期间，幸好遇上了我的老乡谢才前同志。我俩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又是一同参军。他是医院里的护士长，他对我的护理更是关心照顾，亲如手足。我的病情很快好转，与他的关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在临出院前，把我保存了很久也舍不得穿的一双新布鞋送给他留念。后来一直未能相遇，1950年解放后回家探亲时才遇到他。俩人相见格外亲热，他说：“你住院时我照顾不好，你还送鞋给我，我一直记惦你，感谢你。”我说：“不要客气了，应该是我感谢你。”愈谈愈亲热。我俩还谈到一起参军的谢芳德同志，我说：“在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时，进行了一次肃反运动，他任4班长时，有一天突然被抓了起来，进行审查，说他是AB团，过了三天就被杀掉了。他到底是不是AB团，只有天知道。”他听了也很惋惜。又谈了一会儿就分别了。当时我俩恋恋不舍，真是不愿意离开，但为了革命只好含泪分手而别了。

那次负伤我才17岁，抵抗力强恢复能力快，在病床上躺了近两个月才能下床，但不会走路，借了一付拐棍，练习学走路，三天后才慢慢能走路了。那时医院里好多伤愈的战士要出院归队，院领导把他们编成一个连，指定我为指导员，把他们带上前线去。我带他们行军五天，经福建的特乐县找到了部队，由军团政治部把他们分配回原部队。我也回19师59团3营

9连当指导员。这次金鸡战斗使我的肩和肺部受了重伤，虽然基本好了，现已过五十多年了，但是遇到气候变化伤处还隐隐发痛和麻木。因我能正确对待，克服痛苦，兢兢业业做好连队的政治工作，所以我连的干部战士思想稳定，战斗力强。军团如有重要的任务都往往交给我连去执行，无论战斗或筹粮筹款都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因此受到军团政治部的通令嘉奖。后来，我连被评为全军团巩固部队的模范连，还授予一面“巩固部队模范连”的锦旗。

(二)

“同志们！加油啊！夺取洛阳堡，打开建宁城！”

团政委王天龙同志站在路旁的山坡上，对着激流似的从面前通过的红军队伍，用右手挥着拳头，大嗓门地喊着。

在这响亮口号的鼓舞下，红军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有的擦擦额上的汗水，有的举起军用水壶“咕咕”灌几口凉水，又继续迈开大步前进了。

这是1933年11月15日。当时，红7军团的19师在闽北地区活动，企图打下建宁、泰宁等城，扩大红色根据地。经过侦察研究，第一个攻击目标就选择了建宁。建宁城的守敌是刘和鼎的部队，有一定的战斗力。城的西北有座小山，山上有座名叫洛阳堡的据点，俯瞰全城，要夺取建宁，必须首先拿下洛阳堡来。但是，敌人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有三层外壕，三层鹿砦，三层铁丝网，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防守，配备了多挺重机枪，火力很强。这里的确是易守难攻，不好对付。

红19师的59团接受了打开建宁的任务。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们就从百里外的安平圩出发了。急行军一天，终于在夜空中星星熠熠闪光的时候，赶到了洛阳堡的山下。